

安徽歙县“复古工程”：1.6亿重建府衙

核心提示

安徽歙县政府日前决定实施总投资达1.6亿元的徽州古城内的徽州府衙重建工程,该项目将由徽州古城管理委员会引资建设,整个工程计划在2年内完成。

徽州府衙重建工程,迅速引起有关专家和当地市民的热议。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是否有必要用巨大的财力、物力和土地去重复前人的东西?重建徽州府衙,是还原古城历史原貌还是制造假文物?

1.6亿元重建徽州府衙

歙县自秦建制以来,历为郡、州、路、府所在地,千年以来就是府县同城,直至近代才告终结,是古徽州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与四川阆中、云南丽江、山西平遥被史学界并称为当今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四大古城。

1986年12月,国务院公布其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目前歙县仍有明清古民居数千幢,古祠堂上百处,牌坊108座,保存地面文物613处。

徽州府衙一直是歙县这个徽州府城留下的诸多文化遗存之一,直至上世纪80年代,古老的徽州府衙被人为拆除,并在原址上兴建了新的县政府大楼。

为整合徽州古城内的文物资源,从2005年开始,歙县聘请国内著名专家对古城进行了新的规划。除将县机关迁出古城外,歙县政府还斥资2.8亿元对徽州古城内的古城墙、钟鼓楼、府前街等景观文物进行全面保护性修复,对古城内的中和街、斗山街、十横街、大北街、中山巷及打箍井街等历史街区进行保护性修建与开发。

已通过评审的《歙县徽州府衙历史地段保护修建性详细规划》向社会公示,徽州府衙将按照明代府衙资料及风貌重建,成为歙县古城的徽文化核心区。

占地36亩的徽州府衙在原址重建,由南薰楼、仪门、正堂院落、后堂院落和解案院落五大组群,按明清府衙建筑格局资料恢复。南薰楼外组群恢复府衙原有格局,包括照墙、左侧钟楼、承宣坊、左侧旌善亭以及右侧申明亭等,再现明代府衙“规模宏大、气势雄伟、肃穆壮观、人心欢悦”的旧貌。

“知府断案”的正堂,是徽州府衙的主体,按清代形制恢复,还要恢复府衙仪门、息民亭和戒石碑亭等。游客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击鼓鸣冤”的场景,看到清知府劝说百姓息讼与守律的内容。

据介绍,游客进入修复后的徽州府衙,会看到府衙建筑群依中轴线而成,就和故宫一样。在这个建筑空间里,“照壁、承宣坊、旌善亭、申明亭、南薰楼、中心广场、仪门、戒石碑亭、正堂、后堂、宅门、宅前堂、宅后堂、清心阁”等依次而落。核心轴线把各个半开放型小广场串连起来。

徽州府衙区域内还会建徽州历史主题博物馆,包括徽州名人馆、地方历史馆、徽州书画馆、徽州传统工艺馆、徽州民俗馆等。主题展馆和府衙建筑为载体,展示徽文化,包括以府衙文化为核心的徽州历史、徽学、徽州民俗等。

复古伴生的尴尬

歙县政府网上今年2月初挂出的“徽州府衙修复征集建议”的帖子后面,已有数千余网友关注了这个话题,不少网友留下了他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在安徽徽州文化研究所的一位专家看来,重修徽州府衙,用巨大的财力、物力和土地去重复前人的东西,除了出于对古建筑复原的好奇心,其他理由都很牵强。

署名“关心徽州文化”的网友的观点代表了不少观点。他认为,花这么大的代价来重建一个现代的古衙门,没有多大价值。如果这个古衙门现在还在,那花再大的代价也值。

“既然我们对建筑有那么大的爱好,又有那么多的财力物力,何不用来保护散落在徽州乡村的无数濒危建筑?”更多的人提出自己的疑惑。

据歙县文物局不完全统计,仅歙县境内遗存的1911年前建设的各类民宅便有1500多幢,奈于保护经费缺乏等诸多原因,目前县政府只能对列入

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采取有限保护和干预。

黄山市古建筑保护民间专家姚顺涑的调查结果表明,由于坍塌、拆毁改建、出售外流等原因,这些亟待保护的古建筑目前正在以每年5%的速度递减,这些富有代表性的中国古建筑正在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劫难”。

按照徽州古城管理委员会的设想,建成后,该府衙将和周边的南薰楼等古建筑构成保护群,将申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但不少市民和专家对利用原有的府衙遗址建筑,采取明代中期建筑风格来重建的徽州府衙,能成为徽派建筑的巅峰之作表示怀疑。

疑问来自于:第一,当年建造徽派古建的能工巧匠们的手艺,个别的也许还有,但成批的已经没有了,更不要说整个工艺体系。整个徽州擅长徽派古建绝活的不超过100人。

第二,“每幢古建甚至单个构建都原样恢复,使用传统材料实施,不用钢筋混凝土。”这不可能做得到,当年使用的一些建筑材料现在有不少都已经失传了。

第三,即使别的方面也许现代技术能够克隆得出来,可是那段历史时间能够克隆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人类遗产”迄今有700多件,其中有许多都是建筑废墟,至今也没见过哪个国家对这类遗产进行“复建”。

有专家因此认为,与全国一度大



安徽歙县巽坑乡石潭出现云海奇景 均为新华社发

量出现的一些“辉煌”的人造景观一样,徽州府衙将难逃迅速败落的命运。因为重建的徽州府衙终究是仿制品,不会引起人们多大兴趣,人们或许会进去一次之后就不再进去。

歙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办公室负责人告诉记者,网民们关于徽州府衙修复的建议被打印成册,歙县政府有关负责人在上面作出批示,要求在徽州府衙重建工作中吸收参考、采纳积极的建议。

府衙重建宜慎行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应重点突出历史文物、历史街区、古城风貌、无形文化四个方面。在古城保护的思路,做到重点保护、合理保留、局部改造、普遍改善相结合。在古城保护的内容上,注重传统民居的修复、基础设施的改造、排污管网的铺设和环境风貌的整合。在古城保护的具体实践中,实行原汁原味的保护、有根有据的重建、有脉有络的创新。

4月中旬,徽州府衙修复工程在争议中奠基开工,由县政府招商引资的一家具体投资建设。

既然明知“仿古的东西永远是赝品”,地方政府为何痴迷和执著于重建徽州府衙这一文化复古工程?徽州古城管理委员会的解释是,为了“还原千年徽州古城旧貌”、“全面提升徽州古城的历史地位”。

由于近年来“复古古董”、“制造假文物、假文化的现象”,不断暗流涌动,

据新华社



“徽园”大石牌坊



从徽州古城内看仁和楼

大学自重 大学排行榜自清

据《人民日报》报道,成都理工大学曾于2004年和2006年两次邀请“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负责人武书连来校讲座,随后两次给武书连方面汇款数万元,此后该校排名名次上升的经过。随后,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向媒体表态,教育部不赞成、不支持大学排行榜,坚决反对借此向高校拉赞助。

成都理工大学与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之间,究竟执行了怎样的“潜规则”,媒体只是引述知情人的信息来源,目前来看尚无明证。当事双方也都先后作出公开说明,一方否认曾收取赞助费,一方则承认曾支付武书连两笔费用,但属于为校外学者支付的正常费用,与赞助大学排行榜无关。事态首先便陷入了真相无着的境地。

但舆论显然已经触发,真相彻底为武书连收取赞助费排名的嫌疑所取代,加之教育部“不赞成、不支持大学排行榜,反对借此向高校拉赞助”的表态,大学排行榜瞬间遭受公信的灭顶之灾。诸多质疑声中,揭批大学排行榜实质就是赚钱工具有之,疾呼不能让大学排行榜捆绑了大学精神者有之,要求全部取缔大学排行榜者亦有之。

然而,上述声音虽然有其道理,却未必公允。大学排行榜出自民间机构的民间行为,为包括考生、大学在内的整个社会提供免费的评估信息服务。课题组在没有国家拨款的情况下,通过为高校提供专业咨询收取费用,如果不影响课题研究的科学性,理论上并无不妥。因为在此情况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公信成为了民间机构身家的全部维系。一旦失去公信,也就没有了生存空间。

相反,现有体制下,一所大学造假与一张民间排行榜造假,其对各自机构生存的影响程度,却全然不可同日而语。令人诧异的是,大学排行榜丑闻中的主角,竟然不是那些以支付赞助费寻求排名跃升的大学,而是有拉赞助嫌疑的大学排行榜制作者。这种轻重取舍,让人唏嘘今日大学的见怪不怪,社会对民间机构的高危期待,以至于直斥是无良的大学排行榜捆绑了大学精神。

事实上,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各界讨论已经很多,大学排行榜只是透视这一问题的多棱镜。有人办大学,有人评价大学,都是正常社会必要的生态。进而言之,如何评价大学需要有一个科学的系统标准,而之前曾在一段时间内占主导地位的单一评价标准,显然不够科学。在此意义上,大学排行榜这类民间机构的评估行为,其存在有一定的民间基础和社会需要,问题的关键在于管制和规范的缺陷。

从目前情势看,民间机构造假必将丧失社会公信力,自然会受到应有的惩罚,而对林林总总的排行榜的管制与规范,最好的办法就是规范其运作,检验其真伪,曝光其潜规则,让假的差的无立足之地。更需要关注的,就是“大学排行榜”真正的主角——各个大学如何自清自省,如何从功利的世俗追求中脱身而出。

我们不是要为一个民间机构可能的学术造假进行辩护,它已经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而是期待大学精神的真正回归,能使其平心静气面对诸如排行榜之类的社会诱惑。大学排行榜之弊,在榜,也在大学。而破解之道,亦然。 成实

该对官员带病复出进行总体清算了

因三鹿奶粉事件被国务院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的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近日从安徽回到北京重新赴任,担任国家质检总局科技司副司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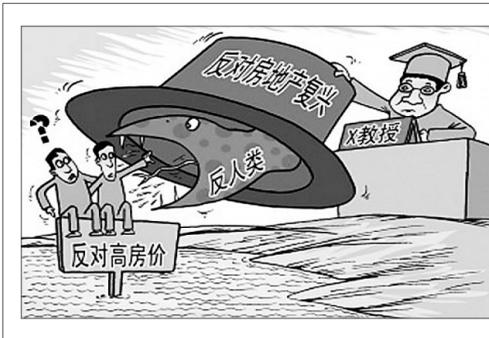
与近年来频频出现的被问责官员复出事件一样,鲍俊凯受处分前已调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级别由副厅升为正厅,以及此次回京任职,均引起舆论大哗。既然被问责官员复出已成为一个“民愤”较大的问题,现在该从总体上为这个问题找到“病根”,并进行全面“清算”了。

按规定,官员辞职或被免职之后,其原有相关职级待遇保持不变;辞职官员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这就是说,官员以辞职或免职的方式被问责,原本就注定了必然复出,他被问责而赋闲在家,不过是享受“带薪休假”。

当前,应全面整合《公务员法》、《党纪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形成统一完善、惩处有力的问责制度体系。要尽量减少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以及

免职之类的象征性问责形式,更多地采用记过、降级、撤职乃至开除公职等处分手段,以强化问责的实际意义,抬高被问责官员复出的门槛。同时,被问责官员复出要全程透明,向社会公示公开。

反之,像现在在很多地方,被问责官员复出搞得偷偷摸摸,非得靠网友“偶然发现”或“人肉搜索”才能为公众所知。这无疑是在帮助那些既无反省与悔过、也无突出实绩的被问责官员蒙混过关。对于幕后的上级官员,也应严厉问责。 其洪



反房地产复兴就是反人类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称:“所有反对房地产复兴的想法都是危害国家利益”,“我给他们的帽子是‘反人类’”(5月6日《信息时报》)。

专家频频惹口水,算来这位算最雷。敢不支持房产,扣你帽子反人类。平民何来此大罪,竟和希魔成同类?敢请教授管好嘴,当心民众恨入髓。

刘道伟/漫画 李军 配诗

什么好事让低保户高兴而死

重庆北碚的年逾五旬的朱先生是低保人员,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病史。一天晚上,他所在社区的领导来到医院探望他,承诺帮助报销部分医疗费。朱先生听后情绪非常激动,并流下了眼泪,后因血压升高导致主动脉破裂而死亡。当地法院认为,医院在已发现朱先生患有高血压的情况下,没有告知其应控制情绪,判决医院赔偿9万余元。(5月5日《重庆晚报》)

这是社会的悲哀,如果医保等社会福利体系是公平、完善的,朱先生就不会激动到这个份上。虽然中国老百姓素以朴实、知足、可爱、忠厚著称,但面对如此辛酸镜头,我们又怎能不“欲语泪先流”呢?低保户在大病面前,已

无路可寻,唯一能巴望的还是政府。当今医药、医疗费虚高,百姓就医难,可谓从来先生“高兴死”的辛酸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即便新医改方案面世,也无法短期内改变底层民众的看病难问题。

公民的生命安康,系牵一个民族兴举之本,与危及生命健康的疾病作战,不是进医院,而是靠百姓的沮丧与无奈,悲怆夫妇相牵投河自尽,父子无奈抓阄谁谁谁治病,低保户“为医疗费报销高兴死”……遗憾的是,面对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我们社会尽快扭转这一局面的合力并未形成,真正解决医患资源不公、干群就医待遇不公的强有力措施仍在没完没了地摸索,似乎永远难以以破这一制度性瓶颈。

在需要财政之手伸至贫者病床前时,我们耳边总会响起“国家不富、财力不济”之声,仿佛这种推诿之词是一张万能膏药,可以贴住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伤口似的。让人纳闷的是,既然财力有限,那么在“三公”消费上就节省才对,但我们看到的却是“红头文件派酒”、“红头文件发烟”等荒唐新闻,读到的却是张家港一行8人豪华公款出国游,动辄花销20多万财政金的丑闻……该彻底清查“三公”消费了,该制度性拯救孤独地躺在病床上无钱治病的贫者了。 周华

公务员享长假 反映权利困境

今年3月,广东省政府曾正式公布5月1日至5月7日放假,后遵循国务院办公厅要求,全省各地各单位取消“五一”调休安排。但据了解,本次“五一”假期,仍有相当数量的广东政府机关实行了7天长假。(《新京报》5月6日)

这着实让全国其他地区的工薪一族,尤其是那些一直抱怨“五一”黄金周被取消的人们艳羡、嫉妒,同时也不免生疑:这一做法合乎此前国办的规定和要求吗?

从形式、程序看,上述做法并未明显违规。据悉,此次广东“五一”放假是“个人自愿愿利用国家法定节假日在‘五一’期间休长假”,按《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有关规定,各单位可根据具体情况和职工本人意愿,灵活安排”。“灵活安排”正是此前国办通知中的原话。另据记者了解,“本次放假广东省政府并未有正式文件下发,而是各个单位领导通过口头传达方式,传达时也强调了自愿原则”。既有国办通知中的相关依据,又避免了“正式文件下发”,且“强调了自愿原则”,法理情理似乎均照顾到了。

但从实质和结果看,此次7天的“五一”长假,在广东公务员中“不约而同”地集体出现,又有明显的怪异之处——既然是“个人自愿”、“不强制调休”,何以又是各个公务员机关集体统一放假?原本个人化、权利化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最终实行的主体,如何又事实上变成了机关单位和公务员?要知道,此前的国办通知中还有“不得擅自调休、自行安排”的要求,这里“不得”的主体无疑正是各公务员机关。也就是说,依据国办通知精神,职工个人按照“带薪年休假”规定,选择休假时限可以“灵活安排”,但公务员机关“不得擅自调休”。

围绕“五一”休假之争,折射的其实是一种权利困境:原本作为职工权利的灵活休假权,在现实中仍高度依附于行政权力而存在——不经过权力的统一安排、领导传达,带薪年休假是很难真正做到自愿自主、灵活安排。只有权力先行许可(哪怕是默许),个人在休假权上的“自愿”才是可能的。缘此,此次意外享受了7天长假的广东公务员,也许应感到幸运——毕竟,他们尚有可直接依附的权力,而那些距离权力遥远的其他行业的职工,则连这种依附的幸运也没有。正如广东企业职工抱怨的,“这一休假方式仅涵盖公务员,有失公平”。

此次广东部分机关的7天长假说到底,仅是权力依附下的偶然产物。如何将权力依附下的权利,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使包括带薪年休假这样的休假权,成为每个劳动者可自主支配、自由享有之物,或许才是真正需要认真思考的。 张峰